

二十世纪康区政治强人夏克·刀登的崛起*

玉珠措姆

内容摘要：本文以德格头人夏克·刀登在德格及康区政治中崛起为例，来探讨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早期，康区出现的与传统精英不同的被称为“当地政治强人”的新精英阶层。这一个案显示了康区基于传统世袭且先赋的地位开始向自致性的地位转变，也向我们揭示康区作为一个区域所具有的特性以及在康区新兴的权威及其合法性不断变化的性质。以夏克·刀登为代表的新精英阶层的崛起，一方面是基于个人魅力、能力、雄心以及政治手腕的娴熟，另一方面是当时的历史潮流把他们推上了“政治强人”的地位。与康区大多数传统势力不同，夏克·刀登富有时代责任感，对当时的大局认识比较清楚，故而能在当时康区的社会中脱颖而出。通过与争夺康区控制权的各方势力建立各种联盟，他不断地增强其权力与权威。他还通过塑造一个统一的康区身份使其权威合法化，并采纳了一些改革的新思想，从而成为可以和德格土司抗衡的权威人物。

* 本文为作者主持的2016年教育部一般项目《民国时期汉藏知识界人士视域中的康区研究》(16YJA770016)的阶段性研究成果之一。

导论

康区的政体通常被认为是静止不变的，政治事务是由传统和惯例支配的，而且领导阶层是通过世袭血统或宗教权威来合法化的。因此，权威常常被认为是一成不变而稳定的。同样地，还有一种看法认为康区是游离在中国中央政权与西藏地方政府这两个权力中心之外的社会，缺乏中央集权的政治体制、复杂的官僚制度和基于先赋性地位和等级的政治结构分化¹。这一假设意味着学者们很少研究康区的政治竞争和权力纷争，并将康区的精英权力结构视为一成不变的。然而，它并不是一成不变的，一旦有机会，雄心勃勃的人物就会对传统体制提出挑战。

十九世纪末和二十世纪初，康区作为清廷和西藏地方政府的两个权力中心的缓冲地带具有一种“中间性”，从而使得该地区成为一个“偶然的边际地区”，这里有许多错综复杂的政治、文化与经济体系²。在这一时期，由于清廷不断加强其对康区的统治，而十三世达赖喇嘛统治下的西藏地方政府则试图遏制清廷势力在康区的进一步渗透，使康区成为一个纷争之地。这就造成了一种不断变化的政治局面，在这种形势下康区各政体的归属感和忠诚度都被考验了³。权力之争也是康区各政体内部发生的，随着康区政治、社会、文化和经济的变迁，这里出现了一个试图从传统的世袭统治家族夺取政权的新兴精英阶层，而世袭统治家族或统治者包括被当地称为“杰布”（ཉུལ་པོ་，国王）、“第巴”（ལྷེ་པོ་，地方官）、“本波”（དཔོན་པོ་，部落首领）的家族或由活佛或堪布代表的寺院。这一新兴精英阶层团体包括在巴塘出现的以在国民党政府中任职的康巴官员格桑次仁（བསྐྱལ་བཟང་ཚེ་རིང་）为代表的被称为“接受过现代教育的精英”⁴，他们通过接受现代教育，

1 详情参见 Geoffrey Samuel, "Tibet as a Stateless Society and Some Islamic Parallels", in *Journal of Asian Studies*, 1982 (41.2): 215-229.

2 参见 Yudru Tsomu, *The Rise of Gönpo Namgyel in Kham: The Blind Warrior of Nyarong*, Lanham, MD: Lexington Books, 2015: 1.

3 参见 Stéphane Gros, "Introduction to Frontier Tibet: Trade and Boundaries of Authority in Kham," in *Cross-Current: East Asian History and Culture Review*, 2016 (19): 1.

4 我之所以将巴塘的新兴精英称作“现代精英”，是因为他们与传统精英不同，接受了现代教育，而其活动也离开了传统的文化环境。这些精英与国民政府建立了密切的关系。就现代教育对康区的影响，参见张敬熙：《三十年来之西康教育》（上卷），上海：商务印书馆，1939：1-85；王笛：《清末川边兴学概述》，《西藏研究》，1986（2）：55-62；林俊华：《甘孜藏区学校教育开发史概索》，《西藏研究》，1993（2）：39-46+17；刘先强：《二十世纪上半叶康区师范教育发展述论》，《西藏研究》，2007（1）：90-95；刘先强：《二十世纪上半叶康区学校教育研究》，成都：四川大学博士论文，2008：1-282；马廷中：《论民国时期甘孜地区的学校教育》，《西南民族大学学报》，2008（5）：68-74；马廷中：《民国时期西康省民族教育的发展》，《西南民族大学学报》，2012（12）：205-209；薛建刚：《试论清末赵尔丰川边兴学及其影响（1906-1911）》，北京：中央民族大学硕士论文，2013：1-49。

得以打破康区社会的传统等级制度，从而实现了向上的社会流动，并将其注意力转向了更广阔的国家舞台和社会变革⁵。也包括像位于康区西部芒康（ལྷོ་ཁམས་）的邦达仓（ལྷོ་ཁང་ཚང་/སྤོ་མང་ཚང་）这样著名的康巴商人家族，崛起成为拉萨出现的具有现代资产阶级特点的中产阶级的一部分后⁶，自二十世纪三十年代以来开始积极参与康区政治以及有关汉藏关系的政治事务。还有像夏克·刀登（བྱ་ཚོ་སྟོན་ལཱ་ལྷན་）这样崛起成为独霸一方统治者的以往的头人等⁷，他们可以被称为“政治强人”⁸。在这里我用的这个词与研究美拉尼亚社会政体的社会人类学家所用的“大人物”一词的意思相似，在美拉尼亚社会世袭统治者开始向魅力性领导转变⁹。在同时代的康区口传资料中，这些人常常被描绘为“钧

- 5 作为国民党政府的官员，格桑泽仁和其他一些“接受过现代教育的康巴精英”被社会和政治现代化的理想所深深地影响。他们的政治抱负也超越了狭窄的地方视野，在民国政府制定对藏政策中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他们也是发起并积极参与“康人治康”运动（ཁམས་པས་རང་སྤྱོད་རང་སྤྱོད་/ཁམས་པས་རང་སྤྱོད་རང་སྤྱོད་）的现代康巴精英。就有关该运动的详情，参见 Peng Wenbin, "Frontier Process, Provincial Politics and Movements for Khampa Autonomy During the Republican Period," *Khams pa Histories: Visions of people, Place and Authority*, edited by Lawrence Epstein. Leiden, Boston: Brill, 2002: 57-84；友珍：《权力政治与地方自治：二十世纪三十年代的“康人治康”运动》，《西藏大学学报》，2010（25.3）：104-108；王娟：《边疆自治运动的地方传统与国家政治—以二十世纪三十年代的三次“康人治康”运动为中心》，《西南民族大学学报》，2013（12）：25-30；罗绍明：《民国时期的康藏精英与“康人治康”运动》，《四川民族学院学报》，2015（24.3）：1-5。
- 6 就邦达仓家族的崛起及其在康区和西藏政治中所起的作用，参见 Carole McGranahan, "In Rapga's Library: The Texts and Times of A Rebel Tibetan Intellectual," *Cahiers d'Extrême-Asie*, 2005（15.1）：253-274；张发贤：《近代西藏巨商邦达仓》，《西藏民族学院学报》，2011（32.2）：25-30+138；美朗宗贞：《从“流浪商人”到噶厦政府的“商上”——邦达尼江考》，《西藏大学学报》，2005（20.3）：50-55；美朗宗贞：《‘邦达仓’反叛噶厦政府始末考》，《西藏研究》，2005（4）：15-21；美朗宗贞：《论二十世纪30～40年代的邦达多吉》，《西藏研究》，2009（1）：71-80；Yudru Tsomu, "Traders as Cultural Brokers on the Sino-Tibetan Borderland during the Republican Period," in *Zangxue xuekan (Journal of Tibetology)*, 2015（14）：177-210。
- 7 在康区南部的一些地区，尤其是曾在巴塘（འབྲུག་ཁང་）和理塘（ལི་ཁང་）土司统治之下的乡城和稻城地区，1912年清朝灭亡后，涌现了一些新的政治活动参与者。这一新的精英阶层由以往传统的统治者属下的头人们组成，他们在传统的统治者未能恢复其权力后崛起，填补这些统治者留下的权力真空。
- 8 在康区政治中涌现的新的当地“政治强人”将其权力建立在个人雄心上，而且起初他们来自志趣相投的支持者组成的小集团，这些支持者当时正在适应并协调与大的政治环境间的关系。除了以往的头人们外，还有一些新的“政治强人”由于在反对驻扎在当地的民国军队的军事行动中以及针对临近地区发起的劫掠活动中显示出的杰出领导能力和勇敢而引人注目，脱颖而出。就有关乡城、稻城靠自己努力而成功的“强人”的详情，参见 Wim van Spengen, "A Glimpse of Ethnicities and Societies on the Frontier through European Travel and Historical Literature in Southern Khams," in *Khams pa Histories: Visions of People, Place and Authority*, 2002: 7-29；威穆·范·斯本根、陈波：《欧洲游记与历史文献中康区南部：族群与社会边缘掠影》，《青海民族研究》，2015（26.4）：1-7；秦和平：《乡城稻城土头统治的由来及其嬗变》，《西藏研究》，2007（2）：1-9；王海兵：《乱世求生：民国时期乡城地区的土头统治》，《西南民族大学学报》，2013（6）：69-74。
- 9 我更喜欢用“强人”这个词。在社会/文化人类学中，“大人物”一词被用来描述从世袭等级转变到魅力性领袖的人物。莱德曼将“大人物”描绘为“通过雄辩才能、非正式的说服力以及巧妙地进行私人 and 公共的财富交换而获得政治影响的男性领袖人物”。参见 James Wright ed., *International Encyclopedia Of The Social and Behavioral Sciences*, 2nd Edition, Oxford: Pergamon, 2015: 567-573。

唐钦波”（འཛོལ་ཐང་ཆེན་པོ།，字面意思为“能力大”）¹⁰，这与英文中的“有能力的人”很相似。这一叙述与新出现的当地靠自己努力而成功的“政治强人”的特点很贴切。

本文通过对夏克·刀登这样一位富有魅力头人崛起的个案研究，来探讨二十世纪早期康区作为一个区域所具有的特性，并揭示康区政治权威是如何变化的，即康区新兴的权威和合法性是如何不断变化的。首先，为了将夏克·刀登的崛起置于德格的历史、政治环境中来探讨，本文首先介绍德格土司政治背景及逐步衰落的情况。然后，着重探讨夏克·刀登是如何在西藏地方政府、国民党政府、四川军阀刘文辉以及积极参与“康人治康”运动的康巴精英间对康区控制权的不断激烈的争夺中，逐步地强大起来成为能够与德格土司相抗衡的势力。

一、“德格王国”的权威及衰落

（一）德格的政治与权力结构

在探讨十九世纪末到二十世纪初德格发生的政治竞争前，有必要对德格的政治与权力结构做一个简要的介绍。德格土司（“德格杰布”，ལྷེ་དགེ་རྒྱལ་པོ།）的辖地被藏东的康区当地人称为“德格王国”，位于康区西北部的金沙江上游盆地，被认为是“人口最密集，且最富有的农业与手工业区”¹¹。在十八世纪中叶，德格土司洛珠降措（སློབ་གྲོགས་རྒྱ་མཚོ། 1752-1755年）统治时期的“德格王国”，下辖由33名被称为“宗果”（རྫོང་རྩོ།）的地方首领/头人统治的二十五个农区宗（རྫོང་།），以及四十三个“牛场”部落（ཆོ་པ་/འབྲོག་སྡེ།）。其辖地包括今白玉（དཔལ་ལྷུ་ལ།）、石渠（ཤིང་གཤུ་ལ།）、德格、原邓柯（འདན་ཁོག།）、西藏昌都（ཆབ་མདོ།）地区江达（འཛོ་མདའ།）五县地区，是康区最大的土司之一¹²。我们可以将德格描绘为一个拥有分权官僚制度的“政体”，这一官僚制度是将土地授予世袭官员，以换取他们行使行政职责的体制。尽管在不同的时期，行使行政职责的人士以及管理的方式都有所变化，但有

10 比如，德格当地人士洛珠彭措等人所编著的《德格文史》一书中，夏克刀登被描绘为“恰司吉加瓦尔克藏旦巴”（ཆབ་སྲིད་གྱི་བྱ་བར་མཁས་མཛངས་ལྡན་པ།，“在政治事务上决策英明”），意指他非常能干。而在平措汪杰的书中，他也被描绘为“朗日旦巴”（རྣམ་རིག་ལྡན་པ།，字面意思是“有智慧的”）。参见洛珠彭措、桑丹、泽汪扎西、项秋曲批、顿堆、阿旺旦增、白玛邓等：《德格文史》，更庆：政协德格县文史资料委员会，1995：191；参见梅·戈尔斯坦、道帷喜饶、威廉司本石初：《一位藏族革命家—巴塘人平措汪杰的时代和政治生涯》（བོད་མི་གསར་བརྗེ་བ་ཞིག།）（藏文版），由琼次仁翻译，达兰萨拉，2006：83。

11 参见 William Woodville Rockhill, *The Land of Lamas: Notes of a Journey through China Mongolia and Tibet*, New York: the Century Co, 1891: 227.

12 详情参见康定民族师专编写组：《甘孜民族自治州民族志》，北京：当代中国出版社，1994：32。

关世袭统治者所拥有的权利核心原则却一直保持不变。“德格王国”官僚制度中最高层是由 200 名贵族组成的。来自德格东部玉隆（ཡིད་ལྷུང་）、南部高日（སྐར་རྗེ）、西部宗巴（འབྲོང་པ）以及北部色须（ཟེར་གཤལ）四个较大地区的“涅钦”（གཉེར་ཆེན，大管家）与强佐（ཕྱག་མཛོད，总管，又译作相子）组成“聂恰联杰康”（གཉེར་ཕྱག་ལྷན་གྲུས་ཁང་），即由聂钦和强佐负责处理土司日常事务的办事机构，为最高世俗政治机构。这些涅巴是从这四大地区被任命为官员的贵族随从（མདུན་སྐོར་/མདུན་སྐོར་ཁག）家庭中选举产生。他们与仲译（བླ་ཡིག，秘书）和森本（གཟིམ་དཔོན，司寝官）共同组成土司衙门最高一级的官员，主要居住在“德格王国”的首府¹³。主管农区二十五个宗（རྫོང་ཁག，“宗卡”或 རྗེ་ཕྱོགས，“德却”）的三十三名地方首领/头人组成了第二级的官员，他们也是选自被任命为官员的贵族随从家庭，大多数也是世袭的。第二级官员还包括另外的四十名贵族随从官员。在德格历史上，有四位来自四大家族的“外官”（ཕྱི་དཔོན་འགོ）大部分时间都保留了他们的权力外¹⁴，其他的官员在需要保卫德格的边疆时，均要负责提供士兵。第三级官员由 80 名被称为“晃扎”（ཉོར་འདྲ）的地方代表或村长组成，作为德格土司的代表或代理人，负责管理乌拉差役。在地方代表之下，还有一些被称为“果巴”（འགོ་པ）的头领，他们并没有官阶，而是从一些平民中选出来，以协助地方代表收税，管理乌拉差役等事宜。

德格土司分封给第一级和第二级官员土地，他们被要求在德格土司衙门内任职，但除了第一级官员外，大多数的世袭首领都没有被要求住在首府。因此，德格的“涅钦”、“宗果”或“顿科”很可能在各自的领地成为可以独霸一方的地方统治者，并变得非常地强大。因此，他们在其领地保持了高度的地方自治。将土地分配给众多地方世袭首领的制度，使他们有可能成为另外的权力中心，可以与德格土司的权力相抗衡。如果德格的各地区变得非常的强大，或这些地区相互联盟的话，这就使德格王成为地方统治者中仅居首位而已，而不是拥有绝对权威的统治者。中国研究者们为了将“德格王国”的政治制度与“政教合一”（ཚོས་སྲིད་བྱུང་འབྲེལ）制度区分开来，通常将前者描述为“政教联盟”¹⁵。通过与寺院统治集团结成紧密的联盟，德格土司家族不仅拥有世俗权力，而且宗教势力也为其服务。为了平衡地方世袭首领的权力，历代德格土司对各教派采取“兼容”

13 参见 འཆི་མེད་རྫོ་རྗེ་དང་ལྷ་གཡང་། ཁམས་ལྗེ་དགེ་བྱུལ་པོའི་སྲིད་དོན་ལོ་རྒྱུས། པེ་ཅིན། གྲང་གོའི་བོད་རིག་པ་དཔེ་སྟུན་ཁང་། 2009: 49-50。

14 四位“外官”分别来自噶蒙拉、索莫仓、梁西色察和贡觉桑珠等家族。参见 ཀམ་བྱུལ་མཚན། རྗེ་དགེ་ཚོས་འབྲེལ་ཏུང་ཁོང་ལ་སྲིད་དཔེ་སྟུང་ཁང་། 1994: 78-79。

15 参见杜永彬：《德格土司辖区的政教及其特点》，《中国藏学》，1989（3）：85-99；曾文琼：《论康区的政教联盟制度》，《西南民族大学学报》，1988（2）：17-25。

的态度，并积极扶持和资助各教派的寺院¹⁶。直到十九世纪早期，德格土司通常兼任伦珠顶寺（ལུན་གྲུབ་སྒྲིབ་པ་）寺主，即俗称德格袞钦（ལྷོ་དགེ་དགོན་ཆེན་པོ་）的寺主，该寺系藏传佛教萨迦派（ས་སྐྱུ་）寺院。但德格土司家族也与分属于宁玛派（རྟོ་མ་མཚན་）和噶举派（བཀའ་འབྲུག་）的五大“家庙”的首席大喇嘛（དབུ་ལྷ་）保持密切关系。

（二）德格土司势力的衰落

十八世纪后期由于“德格王国”的政治面临着内部纷争和外部挑战，其政治势力开始衰落。1790年由于德格土司次旺多吉仁增（ཚོ་དབང་རྫོ་རྗེ་རིག་འཛིན། 生于1786年）年幼，其母亲次旺拉姆（ཚོ་དབང་ལྷ་མོ་）任摄政。在后者任摄政期间，其统治受到一些当地喇嘛和贵族的挑战，并于1808年与目前位于玉树地区的卡囊部落（མཁའ་ནང་ཚོ་པ་）发生战争，她被迫离开德格首府¹⁷。但次旺多吉仁增继位后，对统治漠不关心¹⁸，而随后不断的内乱进一步削弱了德格的势力及其控制其领地的能力。特别是，1862—1863年间瞻对工布朗结（ལྷགས་མཐུང་མགོན་པོ་རྣམ་རྒྱལ་）占领德格¹⁹，使得德格地区的局势变得更加严峻²⁰，这迫使德格

16 参见 Lauren Hartley, *A Socio-Historical Study of the Kingdom of Sde-dge (Derge, Kham) in the Late Nineteenth Century: Ris-med Views of Alliance and Authority*, Indiana University, M.A. Thesis, 1997: 30, 38.

17 参见 Jann Ronis, “Powerful Women in the History of Dege: Reassessing the Eventful Reign of the Dowager Queen Tsewang Lhamo,” *Revue d’Etudes Tibétaines*, 2011 (21): 61-81; ཚོ་དབང་རྫོ་རྗེ་རིག་འཛིན། ལྷོ་དགེ་རྒྱལ་རབས། བྲིན་ཏུ་བུ། སི་ཁྲོན་མི་རིགས་དཔེ་སླུ་ཁང་། 1989 : 91-100-101. 《德格县志》明确提到对土司母亲的不满是由于她私生活的不检点以及过度地偏信竹庆寺（རྫོགས་ཆེན་དགོན་）的僧人。也记述了1799年当土司属下的头人们未能说服土司的母亲将政治权力还给她子时，他们成功地集结武装力量罢黜了土司的母亲，让十三岁的儿子当了土司。然而，正如简·罗尼斯令人信服地显示地那样，这实际上是误读了《德格世德颂》（又作《历代德格土司传》）中有关1798年为土司继承人仁增次旺多吉进行的一个典礼的一段叙述。而且由次旺多吉仁增自己撰写的《德格世德颂》明确提到直到1806年或1808年，他才接管了政府。参见四川省德格县志编纂委员会：《德格县志》，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95：445。

18 次旺多吉仁增（ཚོ་དབང་རྫོ་རྗེ་རིག་འཛིན།）于1828年撰写《德格世德颂》（ལྷོ་དགེ་རྒྱལ་རབས། 又作 དཔལ་ས་སྐྱོང་ལྷོ་དགེ་ཚོས་གྱི་རྒྱལ་པོ་རིམ་བྱོན་གྱི་རྣམ་ཐར་དགེ་ལེགས་རྣོང་གྲུ་ལོ་ལྷོ་དགེ་དབུ་རབ་འཕེལ།）一书，他对统治不感兴趣，而更愿意专心致力于宗教学习和修习。

19 参见 ཡེ་ལེ་རྒྱལ་བྲིམས། ལྷགས་མཐུང་མགོན་རྣམ་པའི་ལོ་རྒྱུས་རགས་རིམ་བརྗོད་པ། (ལག་བྲིས)，9 : 26 ; ཀོང་སྤུལ་ཡོན་ཏན་གྱི་མཚོ་དང་ཀམ་འཕེལ་ལས། ཀོང་སྤུལ་ཡོན་ཏན་གྱི་མཚོ་རྣམ་ཐར། བྲིན་ཏུ་བུ་སི་ཁྲོན་མི་རིགས་དཔེ་སླུ་ཁང་། 1997 : 9 : 293.

20 十九世纪五十年代早期，作为瞻对的一个强大土司，工布朗结的权势不断增长，并开始实施其领土扩张的策略。其崛起不仅在德格，而且在整个康区都产生了严重的影响。就工布朗结兴起的更为详细的研究，参见 Yudru Tsomu, *The Rise of Gönpö Namgyel in Kham: The Blind Warrior of Nyarong*, 2015.

土司同时向清廷与西藏地方政府寻求军事援助²¹。但西藏军队击败工布朗结后，于1865年任命驻瞻藏官（ཉག་རོང་སྤྱི་ཁབ་），西藏地方政府得以将其势力范围扩大到康北其它地区，从而将“德格王国”置于其势力范围以内²²。自此，德格土司家族与西藏地方政府建立了更为密切的关系²³，而后者在德格地区施加越来越大的影响²⁴。而十九世纪七十年代起德格衰落的主要原因堪与一部莎士比亚的戏剧相媲美：德格土司与属下头人间争夺权力以及土司的两个儿子争夺土司之位，无疑削弱了土司家族控制德格地区的能力。土司与头人间的冲突之所以变得激烈，是由于1871年德格土司与其30名大头人到卫藏朝圣时，土司将一位被控杀死了驻藏大臣手下的一名办事人员的随从，交给了驻藏大臣来处罚，最终该随从被驻藏大臣处死。这导致了下属头人对土司强烈不满，于是30名大头人越来越多地拒绝服从德格土司²⁵。

十九世纪末期，由于德格土司与夫人失和，导致其两个儿子争夺土司之位，使德格陷入了激烈的政治派系斗争之中。围绕德格土司的大儿子多吉僧格（རྩོམ་མེད་ལོ་གཤམ་ལོ་མོ་ལོ་མོ་）以及小儿子降白仁青（འཇམ་མཁའ་དཔལ་རིན་ཆེན་）形成的两派一次又一次地向四川当局或西藏地方政府寻求外援。由于后者均致力于增强其对康区的控制，它们积极参与德格两兄弟争夺土司

-
- 21 工布朗结（མགོན་པོ་རྩམ་ལྷལ་）崛起之时，德格在第十九代土司其美达贝多吉（འཆི་མེད་རྟག་པའི་འོ་ཇེ་）统治之下，但1860年他才九岁。工布朗结为了阻止整个德格地区反抗他的统治，将德格土司、土司的母亲以及当地备受尊崇的活佛和喇嘛作为人质，带到瞻对（ལྷགས་མཐུད་）关押。参见 Yudru Tsomu, *The Rise of Gönpo Namgyel in Kham: The Blind Warrior of Nyarong*, 2015: 169-172。其美达贝多吉又名次旺多吉洛珠彭措（ཚོ་དབང་རྩོམ་སྤོ་གྲོ་ལུན་ཚོགས་）或洛珠彭措（སྤོ་གྲོ་ལུན་ཚོགས་）。在《章谷屯志》中，其名字被写为次旺仁增（ཚོ་དབང་རིག་འཛིན་），但在《筹瞻奏稿》中，却被称为次旺多吉洛珠彭措（ཚོ་དབང་རྩོམ་སྤོ་གྲོ་ལུན་ཚོགས་）。在《西康建省记》中，他被称为洛珠彭措（སྤོ་གྲོ་ལུན་ཚོགས་）。根据任乃强的研究，德格土司家族的属民均认为这些名字都是指同一个人。根据当地藏族传统，每当一个人得了重病时，为了消除灾祸，喇嘛会给病人另起一个新名字。参看任乃强：《德格土司世谱》，《任乃强民族研究文集》，1990：263。
- 22 德格土司和霍尔五土司签署了一份宣誓效忠于西藏地方政府的协定，他们必须向驻瞻藏官缴纳赋税，支乌拉差役，并共同分担守御瞻对地区藏军所需费用。详情参见 ལུ་སྐབས་པ་དབང་ལྷག་པའི་ལཱ་ཤ། སྤོ་རྩོན་རྒྱལ་རབས། སྤོང་ཆ། 1976: 45-46。
- 23 德格土司其美达贝多吉（འཆི་མེད་རྟག་པའི་འོ་ཇེ་）娶了率领藏军攻打瞻对的多卡色·次旺诺布（མདོ་མཁར་སྤོ་ཚོ་དབང་རྩོན་བུ་）的女儿次丹卓嘎（ཚོ་བརྟན་སྤོ་ལ་དཀར་），这次联姻是藏政府安排的。参见 See Luciano Petech, *Aristocracy and Government in Tibet, 1728-1959. Serie Orientale Roma, Vol. XLV. Roma: Istituto Italiano per il Medio ed Estremo Oriente, 1973: 76-77; S.A.M. Adshad, Province and Politics in Late Imperial China. Scandinavian Institute of Asian Studies Monograph Series, no. 50. London and Malmo: Curzon Press Ltd., 1984: 86.*
- 24 西藏地方政府对德格的影响是如此之大，以至于德格土司同意“聂钦”和“强佐”这样的重要官职将由西藏地方政府任命，而且愿为守御瞻对地区藏军提供军费援助。参见 British Indian Office document, MSS EUR F80/177.
- 25 参看格勒：《甘孜藏族自治州史话》，成都：四川民族出版社，1984：259；德格县志编纂委员会：《德格县志》，1995：471。

之位的斗争，并试图将自己支持的土司候选人推上土司宝座²⁶。最终，在赵尔丰的军队的支持下，多吉僧格得以逼迫降白仁青及其属下逃离德格²⁷。随后，后者追随十三世达赖喇嘛到了西藏²⁸，降白仁青被授予四品官的“台吉”（ཤའི་རྩི）封号，从而成为西藏地方政府的一名官员²⁹。与此同时，1909年在德格实行“改土归流”时，多吉僧格被授予了世袭“都司”这一流官职位，并移居巴塘³⁰。1912年清朝灭亡时，康区的许多土司、头人纷纷恢复其统治，多吉僧格也回到了德格。当地的汉人官员继续依靠多吉僧格的权威，来统治德格地区，他被任命为“土兵营长”以及“乌拉差役及粮赋委员”³¹。1918年藏军入侵康区时，占领了德格，将多吉僧格及其妻子带到西藏，并将他们软禁了³²。1926年他在西藏逝世，享年50岁，育有一子、三女³³。

二、夏克·刀登的崛起

十九世纪到二十世纪早期，德格土司家族内部的夺权斗争，导致西藏地方政府与中国历代中央政府间争夺和控制康区的斗争越来越激烈，德格社会也陷入几十年动荡不安的局面。这致使德格的精英阶层产生了一种利益冲动，并为一些野心勃勃的地方人士提供了成为另外的权力中心的机会，从而削弱了土司家族的权力和威望。而德格的“顿科”夏克·刀登正是这样一位野心勃勃的当地人物。

（一）夏克·刀登的家庭背景

夏克·刀登于1901年生于德格的夏柯（བྱ་ལོག）地方，其家族在十九世纪末和二十

26 有趣的是，在整个斗争过程中，根据其在某一个特定时间内的利益所在，西藏地方政府曾在不同时期分别支持了这两兄弟。

27 参看赵尔丰：《赵尔丰电赵尔巽，告遵旨进剿昂逆，并传谕瞻对番官，请代奏电》，《近代康藏重大事件选编》（上册），2001：504-505；四川省德格县志编纂委员会：《德格县志》，1995：14-15；白玛邓登，夏克·泽朗口述，郎加、韦刚翻译记录，来作中整理：《德格土司家族内部及其与下属头人之间的纷争械斗》，《甘孜州文史资料集萃》，第1辑，康定：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四川省甘孜藏族自治州委员会，2008：189。

28 参看 ཀམ་རྒྱལ་མཚན། ལྷེ་དགེ་ཚོས་འབྲུང་ཉང་ཁོང་ལ་སླིང་དཔེ་སྤྲོད་ཁང་། 1994：ཤ61；格勒：《甘孜藏族自治州史话》，1984：262；白马邓登、夏克泽朗：《德格土司家族内部及其与下属头人之间的纷争械斗》，2008：189。

29 参看白马邓登、夏克泽朗：《德格土司家族内部及其与下属头人之间的纷争械斗》，2008：189；四川省德格县志编纂委员会：《德格县志》，1995：472。

30 年俸为3000两银子，参看四川省德格县志编纂委员会：《德格县志》，1995：446。

31 参见任乃强：《任乃强藏学论文集》，北京：中国藏学出版社，2009：464-465。

32 参见任乃强：《任乃强藏学论文集》，2009：465；四川省德格县志编纂委员会：《德格县志》，1995：16。

33 参见 འཚེ་མེད་རྗོ་རྗེ་དང་ལྷ་གཡང་། འཕམས་ལྷེ་དགེ་རྒྱལ་པོའི་སློང་དོན་ལོ་རྒྱུས། 2009：ཤ182。

世纪初深深地陷入了德格土司家族的内争之中。祖父夏克·白马勒珠（བྱ་ཚོན་པད་མ་ལས་གྲུབ་པ།）曾任德格土司的“涅钦”³⁴，后来，其父亲夏克·扎西朗结（བྱ་ཚོན་བཀྲ་ཤིས་རྣམ་རྒྱལ།）继承了“涅钦”职位，并大力支持降白仁青争夺土司之位，于1906-1907年被支持多吉僧格的那一派杀害了³⁵。由于其子尚年幼，夏克·刀登的母亲次旺卓玛（ཚོ་དབང་སྒྲོལ་མ།）继承了亡夫的位置，并继续忠于降白仁青一派³⁶。1909年被多吉僧格一派和赵尔丰的军队击败后，次旺卓玛及其孩子们追随降白仁青到了拉萨。最终在那曲（ནག་ཆུ།）地区定居，降白仁青被授予了台吉（四品官）的官位，而夏克家族被任命为降交（བྱང་རྒྱལ།）的头人（འགོ་པ།，果巴）。从而，他们都成为西藏地方政府的一部分³⁷。1910-1911年，降白仁青及其属下协助拉萨军队与清军作战。由于他们作战十分英勇，获得了十三世达赖喇嘛的重赏，给夏克和甄伯（ཤེ་འབོད།）家族在拉萨的色拉（ཤི་ར།）寺附近和后藏的羊卓雍措（ཡམ་འབྲོག་གཡུ་མཚོ།）附近各拨了一座庄园，并分别拨给十几户“科巴”（ཁོ་པ།）家庭³⁸。

十三世达赖喇嘛统治下的西藏地方政府不断开展扩张活动，以将其控制延伸到康区，并增强其在康区的权威，这与夏克家族恢复在德格家乡的权威这一目标相一致。1918年，西藏军队占领昌都时，应夏克·次旺卓玛的请求，十三世达赖喇嘛致信给昌都“基巧”（སྤྱི་ཁྱབ།）噶伦喇嘛强巴丹达（བཀའ་འོན་ལྷ་མ་གུམ་པ་བསྟན་དར།），命令藏军恢复夏克家族在德格的权力，并免除该家族所有赋税及乌拉差役。泽旺志玛担心多吉僧格会采取报复行动，决定暂时在金沙江以西的汪布顶（དབོན་པོ་སྟོང་དབོན་པོ་སྟོང་།）定居，但她将夏克·刀登及其兄长送到拉萨参加培养贵族子弟成为政府官员的“孜洛扎”（ཚེ་སྒོལ་གྲུ།）学习。经

34 白马勒珠以勇敢和足智多谋著称，在十九世纪六十年代将德格土司从瞻对救出，赢得德格土司的充分信任，曾被任命为聂钦（གཉེན་ཚེན།）。根据口传资料，后来由于直接干涉土司母亲摄政却英桑姆（ཚོས་དབྱིངས་བཟང་མོ།）与一位下属头人私通之事，被暗中下毒杀害。

35 参见 འཆི་མེད་ཚོ་རྗེ་དང་རྒྱ་གཡུང་། ལམས་ལྷེ་དགོ་རྒྱལ་པོའི་སྲིད་དོན་ལོ་རྒྱུས། 2009 : 179.

36 夏克刀登的母亲被认为是这一时期三位最有影响力的妇女之一，即俗称为“康区三大魔女”之一。其他两位是第七世孔萨土司央金（雍珠）·堪珠（དབྱངས་ཅན་མཁའ་འབྲོ།）以及上瞻（ཉག་སྟོང་།）的甲日·其麦志玛（རྒྱ་ཅི་འཆི་མེད་སྒྲོལ་མ།）。

37 参见 ཀམ་རྒྱལ་མཚན། ལྷེ་དགོ་ཚོས་འབྲུང་ཉང་ཁོང་ཡ་སྲིད་དཔེ་སྐུང་ཁང་། 1994 : 61 ; 格勒《甘孜藏族自治州史话》，成都：四川民族出版社，1984：262；参见白玛邓登，夏克·泽朗口述：《德格土司家族内部及其与下属头人之间的纷争械斗》，2009：189。降白仁青及其追随者在海南定居后不久，他们截获了赵尔丰写给青海军阀们的一封信，要求后者将降白仁青、夏克以及甄伯三个家族交给他。降白仁青意识到将要面临的危险，他再一次寻求降央协巴（འཇམ་དབྱངས་བཞུང་པ།）的帮助。1911年底正好十三世达赖喇嘛在从北京返回西藏的途中路过拉卜楞（ལྷ་བྱང་བཀྲ་ཤིས་འབྲིལ།）寺，因此，降央协巴请求十三世达赖喇嘛将降白及其追随者带到西藏。

38 参见来作中：《夏克刀登传略》，载《四川省文史资料集萃》，第5卷（民族宗教、华侨编），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96：97；འཆི་མེད་ཚོ་རྗེ་དང་རྒྱ་གཡུང་། ལམས་ལྷེ་དགོ་རྒྱལ་པོའི་སྲིད་དོན་ལོ་རྒྱུས། 2009 : 181 ; 白马邓登、夏克泽朗：《德格土司家族内部及其与下属头人之间的纷争械斗》，2008：191；སྟོ་གྲོས་ལུན་ཚོགས། མདོ་ལམས་ས་སྤྱོད་ལྷེ་དགོ་ཚོས་རྒྱལ་ཚེན་པོའི་རྒྱལ་རབས་ཀྱི་ལོ་རྒྱུས་དབྱེ་བའི་དཔེ་མཛོད་འཛིན་པའི་སྲིད་གྲོས་ལྷེ་དགོ་ཚོང་རིག་གནས་ལོ་རྒྱུས་རྒྱ་ཆ་བརྟུན་གྱི་ལྷུ་ལོན་ལྷན་ཁང་། 1995 : 190.

过三年学习，前者以优异的成绩毕业，这使得他非常熟悉西藏地方政府的事务以及卫藏地区的情况，而且也让他结识了许多贵族家庭的子弟，这些子弟都将会成为西藏地方政府的各级官员。后来的事实证明，这对夏克家族恢复其在德格的权势非常有用³⁹。1918年以来，西藏军队占领了德格土司下辖的五个县，到了1921年夏克·刀登返回德格时，他成为了一位对西藏地方政府非常有用的同盟者，加之他十分熟悉拉萨贵族家族及西藏地方政府的策略，这使他能够得心应手地处理与西藏地方政府的关系，使自己家族的实力逐步得到恢复。1926年，多吉僧格逝世时，其儿子泽旺对堆（**ཚོ་དབང་བདུན་འདུལ།** 1916-1942年）被十三世达赖喇嘛批准继任土司⁴⁰，但是德格的军事和政治权力仍然掌握在由驻扎在德格的藏军军官控制的“德格基巧”（**ལྷོ་དགེ་སྤྱི་ཁུལ།**）手中⁴¹。因此，夏克·刀登不得不尽力争取驻扎在德格的拉萨军队“代本”（**མངའ་དཔོན།**，团长）的支持来恢复其家族的势力。但由于他未能与藏军“代本”琼让巴（**ཁྱུང་རམས་པ།**）建立良好的私人关系，不得不屈从当一名普通的“顿果”⁴²。

（二）夏克家族势力逐步兴起

1929年，夏克·刀登的旧相识克麦（**ཁེ་མེད།**）成为藏军驻德格“代本”时，他的命运发生了变化。克麦委托他在石渠和白玉处理一些重要事务。他不仅精明能干、富有经验，而且办事十分果断。他赢得了克麦的信任，在1930年左右被任命为德格土司政府里的“涅钦”。这样就完成了恢复其家族权力的第一步⁴³。当地口传资料显示，他被认为十分英

39 参见 **འཆི་མེད་ཚོ་ཇི་དང་ཟླ་གཡང་། ཁམས་ལྷོ་དགེ་རྒྱལ་པོའི་སྲིད་དོན་ལོ་རྒྱུས།** 2009 : 181; 白玛邓登、夏克·泽朗 : 《德格土司家族内部及其与下属头人之间的纷争械斗》，2008 : 192 ; 来作中 : 《夏克刀登传略》，1996 : 97。

40 参见四川省德格县志编纂委员会 : 《德格县志》，1995 : 16。

41 据口传资料，第二十二代德格土司泽旺邓登和其他人只可能有一个较低的生活水准，而且甚至各大、小头人进贡的物品或钱财都归驻德格的藏军所有。参见 **འཆི་མེད་ཚོ་ཇི་དང་ཟླ་གཡང་། ཁམས་ལྷོ་དགེ་རྒྱལ་པོའི་སྲིད་དོན་ལོ་རྒྱུས།** 2009 : 182。

42 这时，担任“业恰勒空”（**གཉེར་ཕྱག་ལས་ཁུངས།**，又译作“业夏勒空”）的成员，主要有聂钦囊空活佛（**གཉེར་ཆེན་གྲང་ཁང་སྤུལ་སྐུ།**，又译作聂清囊空活佛）、囊空（**གྲང་ཁང་**）头人河需·伯多（**རྟོ་ཚོ་པད་ཚོར།**）、杂日（**ར་ཅུ།**）头人杂日·聂格（**ར་ཅུ་མི་ཚོང།**）、大相子郎色泽卡（**ཕྱག་མཚོ་ད་རྣམ་སྤུལ་ཚོ་དགའ།**）、小相子俄马·四郎泽仁（**འོག་མ་བསོད་ནམས་ཚོ་རིང་**）等。后来大相子郎色泽卡在江达被控贪污受贿，被琼让（**ཁྱུང་རམས་པ།**，又译作“穷热”）罢免。俄马四郎泽仁（**འོག་མ་བསོད་ནམས་ཚོ་རིང་**）补任大相子职位。参见 **འཆི་མེད་ཚོ་ཇི་དང་ཟླ་གཡང་། ཁམས་ལྷོ་དགེ་རྒྱལ་པོའི་སྲིད་དོན་ལོ་རྒྱུས།** 2009 : 182 ; 白玛邓登、夏克泽郎 : 《德格土司家族内部及其与下属头人之间的纷争械斗》，2008 : 192。

43 那时，又遇聂钦囊空活佛因企图毒杀杂日头人降央洛珠（**འཇམ་དབྱངས་སྒོ་གྲོལ།**）和戈沙（**མགོས་གཟའ།**）小头人戈沙·汪吉（**མགོས་གཟའ་དབང་རྒྱལ།**）事败露，被解送昌都听候西藏驻昌都总管审理。参看其 **འཆི་མེད་ཚོ་ཇི་དང་ཟླ་གཡང་། ཁམས་ལྷོ་དགེ་རྒྱལ་པོའི་སྲིད་དོན་ལོ་རྒྱུས།** 2009 : 183 ; 白玛邓登、夏克泽郎 : 《德格土司家族内部及其与下属头人之间的纷争械斗》，2008 : 192。

勇，富有洞察力，且能言善辩，并善于与各种人物巧妙周旋⁴⁴。此时他位居德格土司政府最核心的圈子中，逐渐巩固了其家族势力。

1932年，德格土司泽旺对堆重新获得对德格的控制权时，夏克·刀登也极尽全力试图赢得土司的信任。此时，在西藏地方政府的支持下，德格土司家族内部出现了一定程度的稳定局面。这一时期，金沙江以东地区藏、汉军队间的军事冲突十分频繁，西藏地方政府在这一地区的势力逐渐被削弱。1932年，西藏地方政府与川康当局达成并签署了“岗托协议”（སྐྲ་བོག་གྲོས་ཚད）。在该协议中，西藏地方政府同意将其军队撤退到金沙江西地区⁴⁵。那时，白玉的河坡（དྲ་པོ）和其它地区头人发起了反对德格土司的叛乱，夏克·刀登率领军队平息了这次叛乱，表现出对德格土司十分忠诚，获得了后者的信任⁴⁶。

西藏地方政府虽然已将其军队撤离包括德格在内的康区，但它继续将德格视为是其管辖之下的一个地区，并试图从德格土司下辖的金沙江以东地区征收赋税⁴⁷。夏克·刀登开始发动当地民众反对西藏地方政府，他在德格民众中作为一位能干且忠诚大臣的名声和形象在不断增强。德格土司也开始依靠他来完成德格政府的许多事务，他也清楚地意识到了这一时期其在德格的地位取决于土司的保护和支持。夏克·刀登为了进一步巩固和扩大其权力基地，像康区的其他许多精英一样，运用了建立婚姻联盟这一常见的策略。1933年，他娶了玉隆地区的拉日头人（ལྷ་རི་དཔོན）高钟彭措（བསྐྱལ་བཟང་ལུན་ཚོགས་གསལ་ཕུག་པོ）的大女儿四郎群措（བསོད་ནམས་ཚས་མཚོ），该头人比较强大，统治1000多户家庭⁴⁸。不久，拉日头人的独子骑马摔死后，他又以女婿的身份掌握了这一地区的实权，其女婿崩卡·朗结多吉（སྤོམ་ཁ་ནམ་བུ་རྒྱལ་ལྷོ་མེ）成为了玉隆地区的总司令⁴⁹。他还安排一些亲属和亲信与德格土司属下的势力较大的头人家庭以及甘孜的孔萨（ཁང་གསར་）和麻书（མ་

44 参见一位佚名学者于1982年对夏克刀登的哥哥夏克·泽朗的采访，博客文章网址为 <http://wyxj70.blog.163.com/blog/static/38886932201321710747116/>；任乃强：《德格土司系谱》，载《任乃强藏学文集》下册，北京：中国藏学出版社，2009：187-188。

45 那时，泽旺邓登17岁，他被任命为“德格、白玉、邓柯、石渠等五县团务督察长”及刘文辉统治下的德格县政府“土兵营长”。并像其他政府官员一样，他也领一份月工资。夏克·刀登和其他人也安排泽旺邓登娶囊谦（ནང་ཚེན）土司之女降央伯姆（འཇམ་དབྱངས་དཔལ་མོ）为妻。

46 参见四川省德格县志编纂委员会：《德格县志》，1995：19；来作中：《夏克刀登传略》，1996：98。

47 1946年夏克·刀登在金沙江西的同普（འདྲོ་མངའ་，今江达）境内，率领当地百姓抗拒西藏地方政府的征粮活动。参见来作中：《夏克刀登传略》，1996：98；འཚི་མེད་རྗོ་རྗེ་དང་ལྷ་གཡང་། ཁམས་སྡེ་དགེ་བྱུ་པོའི་སྲིད་དོན་ལོ་རྒྱུས། 2009: 179。

48 参看འཚི་མེད་རྗོ་རྗེ་དང་ལྷ་གཡང་། ཁམས་སྡེ་དགེ་བྱུ་པོའི་སྲིད་དོན་ལོ་རྒྱུས། 2009: 183；来作中：《夏克刀登传略》，1996：98。

49 参看འཚི་མེད་རྗོ་རྗེ་དང་ལྷ་གཡང་། ཁམས་སྡེ་དགེ་བྱུ་པོའི་སྲིད་དོན་ལོ་རྒྱུས། 2009: 184。

3) 土司家族联姻，以增强自己的势力⁵⁰。

(三) 夏克·刀登与“康人治康”运动

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中期，夏克·刀登敏锐且快速地掌握了当时内地政治发展形势以及顺应这种发展趋势的重要性。康区精英中比较保守的那些传统派实力人物，对当时内地正在发生的巨大变化不甚了解，这使他从这群精英中脱颖而出。他的政治抱负从德格土司政府转向了整个康区事务，并将他关注的政治问题及参与的政治活动延伸到德格以外的地区。开始成为整个康区的关键政治人物之一。

1935年，他积极参与了由噶然喇嘛（མགར་ར་ལྷ་མ་，又名诺那呼图克图，ནོར་ལྷ་ལྷ་མོ་ལྷ་མོ་；ནོར་ལྷ་ལྷ་མོ་ལྷ་མོ་）发起的“康人治康”运动，后者是流亡于内地的类乌齐（རི་བོ་ཆེ）寺的一位富有影响力的喇嘛，其目标是将西藏和四川军阀刘文辉的军队都赶出康区。二十世纪30年代，康区精英开始对西藏地方政府和民国政府对康区事务的干涉做出反应，并开始宣传康区自治的思想。1935年，噶然喇嘛被民国政府派去阻止红军进入康区时，将康区各地的有影响力的土司、头人和寺庙主持、执事等召集到康定参加宣慰大会，夏克·刀登参加了此次大会。噶然喇嘛也试图将刘文辉的军队赶出康区，以在康区建立一个自治政府。夏克·刀登被噶然喇嘛建立康区自治政府的主张深深地吸引住了，不仅将此视为恢复康区稳定的一种手段，而且认为这是康区免受西藏和民国政府干涉其事务的一种办法。根据其兄长夏克·泽朗的回忆，夏克·刀登将“实行地方自治，力图民族平等，废除乌拉制度，改进耕牧技术；发展文教事业”等五项纲领和一些设想记录在笔记本上⁵¹。

1936年初，夏克·刀登、噶然喇嘛与著名“邦达三兄弟（སྤང་མདའ་བླ་སྤྱན་གསུམ་/སྤོམ་མདའ་བླ་སྤྱན་གསུམ་）中最小的一位“邦达·多吉（སྤང་མདའ་རྟོགས་རྒྱལ་/སྤོམ་མདའ་རྟོགས་རྒྱལ་）和甘孜白利（བེ་རི）土司属下大头人顿珠朗结（དོན་གྲུབ་རྣམ་རྒྱལ་，又名邓德杰）一道秘密组成了一个叫做“和睦四友”（མཐུན་པ་སྤྱན་བཞི）的政治团体，以解决内部分歧，实现康区统

50 夏克·刀登也通过由其部分亲戚和亲信与其他有权势的土司、头人结成婚姻联盟，从而与其他地区的实力人物建立了良好的关系。他促成亲戚结穷（འཕུ་ཆུང་）大头人的独生子结穷·泽多（འཕུ་ཆུང་ཚོ་རྗོན་）入赘于甘孜孔萨家，丁古（དིལ་མགོ་）头人的儿子丁古·降呷（དིལ་མགོ་འཇམ་དགའ་）入赘于甘孜大头人阿都拉呷（ཨ་བུལ་ལུ་དཀར་ཚང་）家，西莫（ཞིང་མོ་）大头人的独生子绕呷（རབ་དགའ་）入赘于甘孜麻书家的大头人锡娘（另一种说法是入赘于甘孜麻书家）家，进而得到了甘孜地区土司、头人的支持。参见 འཆི་མེད་རྗོ་རྗོ་དང་ལྷ་གཡང་། འཇམ་སྤེ་དགེ་རྒྱལ་པོའི་སྤྱིད་དོན་ལོ་རྒྱུས། 2009: 184；来作中：《夏克刀登传略》，1996：98。

51 参见一位佚名学者于1982年对夏克刀登的哥哥夏克·泽朗的采访，博客文章网址为 <http://wyxj70.blog.163.com/blog/static/38886932201321710747116/>。

一⁵²。夏克·刀登与噶然喇嘛建立了密切的合作关系，并支持后者的属下杀害德格县长陈荣光、邓柯县长张子愚以及其它刘文辉任命的官员。但是，最终由于噶然喇嘛不幸染病身亡，由他发起的此次“康人治康”运动就不得不终止了。尽管如此，夏克·刀登和邦达·多吉等人仍然继续提倡和推动“康人治康”思想的传播，然而，他支持和参与“康人治康”运动的前提是保证外来势力不干涉康区政治。这一原则在他处理1939年九世班禅行辕和孔萨土司发起的“康人治康”运动的方式中得到了体现。当时前者与驻甘孜的刘文辉的军队间发生武装冲突，曾以公开主张“康人治康”的名义，向夏克·刀登和德格土司寻求援助，但夏克·刀登拒绝卷入这场冲突。因而，尽管他们在甘孜、瞻化、炉霍县任命县长，但未能干涉德格的事务⁵³。这充分证实了当时夏克·刀登在康区所享有的地位和权力。他虽然参与了噶然喇嘛发起的“康人治康”运动，但清楚地意识到要将刘文辉及其军队赶出康区是非常困难的，也不愿意看到班禅行辕成为康北的首要势力，于是做出了不参与此次运动的决定。根据平措汪杰（ལུན་ཚོགས་དབང་རྒྱལ་）的回忆，与格桑泽仁（གསལ་བཟང་ཚེ་རིང་）一样，夏克·刀登也将康巴人与生活在金沙江以西的藏人视为属于不同的民族⁵⁴。他也不喜欢拉萨贵族及驻康区的藏军在康区的所作所为。以他看来，西藏地方政府的“德格基巧”在二十世纪初统治德格时，他们可以被视为康巴人民的压迫者⁵⁵。总之，通过与噶然喇嘛及其他志同道合的康巴精英的密切接触，夏克·刀登接触到了内地一些复杂的政治思想，了解了不少当时形势，对内地、西藏和康区的政治有了更深刻地认识。

（四）夏克·刀登与红军的关系

红军长征过甘孜藏区又给夏克·刀登提供了一个接触和了解红军的主张和政策的机会。1936年春，红军抵达道孚（དུའུ）、炉霍（ལུ་ཁོ་འགོ）和甘孜（དཀར་མངོས）地区时，他与德格的其他一些大头人被德格土司派到甘孜，各率一部对红军进行阻击⁵⁶。但被红军击

52 该团体通常会在康区各地相聚，并举行各类活动的聚会。该团体的象征标志是藏族传统的“和睦四友”，即大象、猴子、兔子和鸟，它们是友谊和团结一致的象征。

53 参见 འཆི་མེད་རྗོ་རྩེ་དང་ཐང་གཡང་། འཕམས་ལཱ་དགེ་རྒྱལ་པོའི་སྲིད་དོན་ལོ་རྒྱུས། 2009: 191-192。

54 正如在汉文中“民族”和“族群”这两个词没有明确地区分，在藏文中“米日”一词也可译为“民族”或“族群”。

55 参见 Melvyn Goldstein, Dawei Sherap, William Siebensschuh, *A Tibetan Revolutionary: The Political Life and Times of Bapa Phüntso Wangyé*,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2004: 54。

56 参看 འཆི་མེད་རྗོ་རྩེ་དང་ཐང་གཡང་། འཕམས་ལཱ་དགེ་རྒྱལ་པོའི་སྲིད་དོན་ལོ་རྒྱུས། 2009: 188；来作中：《夏克刀登传略》，1996：98-99；中共甘孜州委党史研究室：《红军长征在甘孜藏区》（第2版），2012：185。

败了，他本人受伤被俘⁵⁷。被俘后，他受到了红军的优待。时任红三十军政委的李先念亲自与他谈话⁵⁸，红军总司令朱德也接见了，向他介绍共产党的民族、宗教政策以及政治主张。在红军的耐心教育下，他给德格土司写了一封信，请求后者不要再和红军作战。后来，在德格土司的授权下，夏克·刀登与红军代表王维舟签订了“互不侵犯协定”⁵⁹。1936年5月，当博巴人民共和国中央政府在甘孜成立时⁶⁰，夏克·刀登当选为军事部部长⁶¹。他以实际行动积极支持红军北上，除了协助安置伤病员外，还为红军战士提供帮助，并协助共产党人征集急需的粮食及提供必需的牛、马等驮畜进行运输。在红军离开甘孜时，他还组织支援了红军牦牛400多头、马100多匹，并派人给红军担任向导和翻译⁶²。夏克·刀登与共产党人建立的密切关系，以及他斡旋和调解共产党人与康巴人之间关系的能力，增强了其在康巴人和汉人中的声望。

（五）夏克·刀登与刘文辉的关系

夏克·刀登的行为引起了四川军阀刘文辉的注意，后者对他参与噶然喇嘛的“康人治康”运动不满，而且对他与共产党的密切合作更加不满。红军离开康区后，夏克·刀登担心刘文辉会报复他，1937年准备逃往西藏。但刘文辉清楚地意识到要确保康区的

57 就德格各部与红军交战的详情，参见 འཛི་མེད་རྗོ་རྗེ་དང་ལྷ་གཡང་། ཁམས་ལྷེ་དགེ་བྱུང་པོའི་སྲིད་དོན་ལོ་རྒྱུས། 2009 : 188 ; 白马邓登、夏克译朗：《德格土司家族内部及其与下属头人之间的纷争械斗》，2008 : 199。

58 参见《李先念传》编写组等编：《李先念年谱（第1卷）》，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 : 136；来作中，《夏克刀登传略》，1996 : 99；中共甘孜州委党史研究室：《红军长征在甘孜藏区》（第2版），2012 : 186。

59 邓俊康、李昆壁：《夏克刀登（1900-1960）》，2009 : 190；来作中：《夏克刀登传略》，1996 : 99；中共甘孜州委党史研究室：《红军长征在甘孜藏区》（第2版），2012 : 186。

60 博巴中央政府发布了《博巴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宣布了波巴政府的十条纲领。就纲领的具体条款，参见中共甘孜州委党史研究室：《红军长征在甘孜藏区》（第2版），2012 : 190。

61 参见中共甘孜州委组织部等：《中国共产党四川省甘孜藏族自治州组织史资料》，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91 : 16-17；邓俊康、李昆壁：《夏克刀登（1900-1960）》，2009 : 190；中共甘孜州委党史研究室：《红军长征在甘孜藏区》（第2版），成都：成都科技大学出版社，2012 : 187；而来作中的文章中则将政府的名称写作“中华苏维埃博巴中央”，并含糊地说夏克担任了博巴政府的领导成员。目前我们掌握的资料中显示，有关夏克在博巴政府中担任的职务的记载不一致。平措汪杰在其回忆藏族老红军扎喜旺徐（བཀྲ་ཤིས་དབང་ལྷུག）的文章中宣称夏克任外交部长，而白马邓登、夏克·泽郎（ཉལ་ཤོད་ཚེ་རྩམ་）叙述说夏克任中华苏维埃甘孜博巴政府的副主席（194）。而1950年7月邓小平在《关于西南少数民族问题的报告》中谈到：波（博）巴政府的军事部长夏克刀登，财政部长邦（帮）达多吉。另外，中共德格县工委1953年编撰的《夏克刀登小传》中称夏克·刀登担任波巴政府军事部长。后两种资料引自中共甘孜州委党史研究室：《红军长征在甘孜藏区》（第2版），2012 : 237 注释1。

62 参见来作中：《夏克刀登传略》，1996 : 99；འཛི་མེད་རྗོ་རྗེ་དང་ལྷ་གཡང་། ཁམས་ལྷེ་དགེ་བྱུང་པོའི་སྲིད་དོན་ལོ་རྒྱུས། 2009 : 190；有趣的是，邓俊康、李昆壁的文章中则指出，夏克·刀登送给红军150多头牦牛、50多匹马或一部分粮食。与来作中文章中提供的数据有所出入，有可能这里的数据指的是夏克·刀登本人提供的。参见邓俊康、李昆壁：《夏克刀登（1900-1960）》，2009 : 190。

安定，需要得到德格土司以及其他土司、头人支持的重要性。于是他派了白玉县县长范昌元去面见德格土司及其大臣们。据当地的口传资料显示，范昌元传达了刘文辉试图与德格土司及其大臣们冰释前嫌的意见⁶³。刘文辉宣称将不会对那些参与了噶然喇嘛试图将他的军队赶出康区活动的人们采取行动。德格土司似乎被刘的意见说服了，因此，催促夏克·刀登当面向刘文辉道歉⁶⁴。尽管这会使夏克·刀登颜面尽失，但为使局面变得对自己有利，他只好这么做了。他与刘文辉在康定的会晤为他与后者建立私人联系提供了机会⁶⁵。

夏克·刀登意识到西藏地方政府在康区的权威正在不断衰落，而刘文辉的影响却在不断增长，认为必须与刘建立更加牢固的关系，也有必要充分地了解川省各大势力的政治观点及立场。于是，1938年他参加了由刘文辉在康定主办的“西康保安行政讲习会”。该会是培养康区地方首领现代行政能力的现代化项目，康区地方各土司、头人都被敦促参加该会的相关培训，但是作为康区普遍的传统做法，诸土司、头人都派了自己的仆人或下属官员参加培训。夏克·刀登是参加培训的唯一一位德高望重的地方首领⁶⁶，这表明了他愿意放下其身份和地位，来积极学习现代知识，也结交了不少藏汉官员。

刘文辉任命夏克·刀登为西康特种保安副队长，这与德格土司的官阶相同，使他成为康区最强大的地方实力人物之一。后来，德格县长向刘文辉建议说后者的官职不应该与德格土司一样，因此，土司被授予了区副指挥之职。表面上土司似乎掌握着德格的权力⁶⁷，但实权都掌握在夏克·刀登手里。这不仅表现在德格以外的群体都与他进行谈判和交涉，而且，有趣的是德格当地人也将他视为手握大权的实力人物⁶⁸。夏克·刀登在西康政府中的作用和地位很快就提高了，先后担任“西康省参议员”、“德格县参议长”等职⁶⁹。这一时期夏克·刀登所采用的增强自身实力的另一个手段是加入国民党⁷⁰，并与和国

63 参见邓俊康、李昆璧：《夏克刀登（1900-1960）》，2009：190；*འཆི་མེད་དོན་རྗེ་དང་ལྷ་གཡང་། ལམས་ལྷེ་དགེ་རྒྱལ་པོའི་སྲིད་དོན་ལོ་རྒྱུས།* 2009: 190。

64 参见 *འཆི་མེད་དོན་རྗེ་དང་ལྷ་གཡང་། ལམས་ལྷེ་དགེ་རྒྱལ་པོའི་སྲིད་དོན་ལོ་རྒྱུས།* 2009: 190。

65 他们将杀害德格县和邓柯县县长的罪责都归咎于噶然喇嘛。参见 *འཆི་མེད་དོན་རྗེ་དང་ལྷ་གཡང་། ལམས་ལྷེ་དགེ་རྒྱལ་པོའི་སྲིད་དོན་ལོ་རྒྱུས།* 2009: 190。

66 参见任乃强：《德格土司系谱》，载《任乃强藏学文集》（下册），2009：188。

67 这与德格土司的官阶相同，使他成为康区最强大的地方实力人物之一。后来，德格县长向刘文辉建议说夏克·刀登的官职不应该与德格土司一样，因此，土司被授予了区副指挥之职。

68 参见任乃强：《德格土司系谱》，载《任乃强藏学文集》（下册），2009：188。

69 参见 *འཆི་མེད་དོན་རྗེ་དང་ལྷ་གཡང་། ལམས་ལྷེ་དགེ་རྒྱལ་པོའི་སྲིད་དོན་ལོ་རྒྱུས།* 2009: 190-191。

70 经万腾蛟、灵雀寺（*ཉི་མཚོ་དགོན་ཉལ་མཚོ་དགོན་*）堪布（*མཁའ་པོ་*）麻倾翁（*མ་དབང་ཚོས་མཚོ་མཚོ་དབང་མ་བྱུང་ཚོས་མཚོ་མཚོ་*）介绍，夏克·刀登参加了国民党。参见来作中：《夏克刀登传略》，1996：99；*འཆི་མེད་དོན་རྗེ་དང་ལྷ་གཡང་། ལམས་ལྷེ་དགེ་རྒྱལ་པོའི་སྲིད་དོན་ལོ་རྒྱུས།* 2009: 191。

民党中央关系密切的邦达·多吉、格桑益西（བསྐྱལ་བཟང་ཡི་ཤེས）、格桑群觉（བསྐྱལ་བཟང་ཚོས་འབྱོར，又名刘家驹，为九世班禅的秘书）、顿珠朗结等保持着密切联系⁷¹。1940年，康区的政治日益被卷入了共产党与国民党间的对抗之中。康巴精英阶层分为三个派别：即分别与国民党和共产党结盟的派别，以及接受了新思想，寻求彻底改变康区社会制度的团体。该团体中最著名的是平措汪杰，通常被称为平汪。他曾写道：“我开始与德格最有名的贵族之一夏克·刀登建立联系，他来自于德格当地最富有、最有权势的家族之一，也是德格政府中一位位高权重的大臣。他有能力即刻召集上百名武装民兵……”⁷²。平措汪杰试图说服夏克·刀登脱离刘文辉，并倡议发动一个涵盖整个操藏语地区的泛-藏区运动，夏克·刀登对此持怀疑态度。平汪在其回忆录中写道：“他对试图将汉人赶出‘康区’持怀疑态度。如果试图驱逐国民党军队和官员的话，他本人及其家族将会失去很多东西。担心一旦采取措施废除掉汉人（民国政府设立的）县政府，一定会有更多的汉人到康区来”⁷³。夏克·刀登与刘文辉发生冲突是由于更传统的政治利害关系。

1942年德格土司泽旺邓登逝世时，其子乌金霞（ཨོ་རྒྱལ་སྐྱབས，又名乌呷，ཨོ་དགའ）年仅四岁。此时，夏克·刀登看到了一个能够将自己所推出的人选扶持上德格土司之位的机会，他主张由降白仁青之子格桑旺堆（བསྐྱལ་བཟང་དབང་འབྲུག 1912-1984年）与其堂兄的遗孀，即降央伯姆结婚，并继承土司之位。但遭到了“土司派”的反对，该派提议由八邦寺（དཔལ་སྐྱངས་དགོན）的司笃活佛（སི་རྩུ་པད་མ་དབང་མཚོག）暂行土司职权，而夏克·刀登也明确反对⁷⁴。最后，议定由降央伯姆代行土司之职，待乌金霞成年继位。刘文辉清楚地知道夏克·刀登非常渴望建立一个自己的权力基地，并日益成为康巴首领中最有影响力的人物之一，而且不能确定他是否对自己忠诚。1944年，夏克·刀登派人杀死了与自己有私仇的阿都土司翁呷（ཨ་ཐུ་དཔོན་དབང་དགའ），后者是刘文辉任命的土兵营长，也是刘文辉的忠实追随者。因此，刘文辉曾命令德格六区保安司令龚耕耘将夏克·刀登处死。经军统特务、德格县长范昌元通风报信，夏克·刀登才得以幸免。

（六）与德格土司矛盾激化：挑战土司的权威

71 参见来作中：《夏克刀登传略》，1996：99；འཆི་མེད་རྗོ་རྗེ་དང་ཟླ་གཡང་། འཕམས་ལྷེ་དགེ་རྒྱལ་པོའི་སྲིད་འོན་ལོ་རྒྱལ། 2009: 191。

72 参见 Melvyn Goldstein, Dawei Sherap, William Siebenschuh, *A Tibetan Revolutionary: The Political Life and Times of Bapa Phüntso Wangyé*, 2004: 53.

73 参见 Melvyn Goldstein, Dawei Sherap, William Siebenschuh, *A Tibetan Revolutionary: The Political Life and Times of Bapa Phüntso Wangyé*, 2004: 54-55.

74 参见 འཆི་མེད་རྗོ་རྗེ་དང་ཟླ་གཡང་། འཕམས་ལྷེ་དགེ་རྒྱལ་པོའི་སྲིད་འོན་ལོ་རྒྱལ། 2009: 191-194；白马邓登、夏克泽郎：《德格土司家族内部及其与下属头人之间的纷争械斗》，2008：195。

降央伯姆开始代行土司职权时，非常清楚夏克·刀登不断增长的权势，对其儿子的统治形成一大威胁。为了牵制后者，主要依靠他的两位对手，即德格土司政府内的两大实力人物，即俄马相子索南次仁（འོག་མ་ཕྱག་མཛོད་བསོད་ནམས་ཚོ་རིང་）和结穷·泽多（ལུ་ཚུང་ཚོ་རྗོང་）。这两人一掌权，夏克·刀登就受到了一定的排挤⁷⁵。1946年，俄马相子设计，指使下属设宴款待，拟毒死夏克·刀登，但被后者察觉，未得逞。这使得他与“土司派”的矛盾进一步加深，返回玉隆，拒绝回到土司衙门，从而公开与降央伯姆决裂。

同年，得到德格土司支持的麦宿的两个头人家族，即索莫（སོག་མོ）和结穷（ལུ་ཚུང་）家族由于草场纠纷暗杀了与夏克家族世代交好的白玉头人赠伯·拉加（བློ་འབོད་ལྷ་རྒྱལ་）后，两派间的嫌隙就更进一步加深了⁷⁶。此时，他意识到建立一个自己的权力基地的重要性，并开始采取更亲民的策略，将自己重新塑造为一名社会改革者，以及普通百姓反对德格土司家族的支持者。于是，于1947年公开打出反对德格土司的旗号，提议要废除土司制度，废除乌拉差役⁷⁷。他进一步提出建立“米色杰考”（མི་སེར་རྒྱལ་ཁབ་，意为“人民的国家”），实行“康人治康”⁷⁸。他选择用“米色”（意为“人民”）这一词，清楚地表明是一场激进的变革。同年，夏克·刀登鼓动民众拒绝向德格土司支应培修土司衙门的差务，仅有三分之一的差民应差，个别地方还武装抗差⁷⁹。他还将麦宿（ལྷོ་གོང་མེ་ཤོད་）地区与赠伯家族发生冲突后逃亡的三个家族的土地、房屋、牲畜和粮食全部分给麦宿的差民，这一行动受到了当地贫苦差民的热烈欢迎，并开始将其他一些差民吸引到他这一派来⁸⁰。不久土司派人到白玉河坡地区征收粮食时，夏克·刀登命令各村抗拒交粮；土司

75 事实上，1930年左右，夏克·刀登成为“聂钦”执掌处理日常公务的大权时，就让其对手们忌恨他，他们就结成联盟与他争权夺利。详情参见 འཇི་མིང་རྗོ་རྩེ་དང་རྒྱ་གཡང་། ལམས་ལྷེ་དགེ་རྒྱལ་པོའི་སྲིད་འོག་ལོ་རྒྱུས། 2009: 197。

76 赠伯家族是降白仁青的忠实支持者，曾与夏克家族一道追随后者前往西藏。因此，夏克·刀登对暗杀白玉头人的官员恨之入骨，也对降央伯姆极为不满。参见来作中：《夏克刀登传略》，1996：100；邓俊康、李昆壁：《夏克刀登（1900-1960）》，2009：191；白马邓登、夏克泽朗：《德格土司家族内部及其与下属头人之间的纷争械斗》，2008：197-199。

77 参见四川省档案馆藏 1951年1月5日夏克刀登致贺龙、邓小平信件。

78 参见来作中：《夏克刀登传略》，1996：100；白马邓登、夏克泽朗：《德格土司家族内部及其与下属头人之间的纷争械斗》，2008：201。

79 参见中科院民族研究所四川调查组：《德格地区社会调查报告》，1963：32。

80 参看白马邓登、夏克泽朗：《德格土司家族内部及其与下属头人之间的纷争械斗》，2008：201；来作中：《夏克刀登传略》，1996：100。

派兵强征时，他组织人马抗击，在群众的支持下，赶走了德格土司派驻当地的“宗本”⁸¹。夏克·刀登的上述策略被证明为是非常受欢迎的，德格土司辖区内的许多地区都开始追随他，其势力逐渐增加。到1950年，夏克·刀登的一派有大小头人近百名，辖区民众17000余户，其势力在白玉、邓柯、石渠、德格四县占绝对的优势，成为康北一大势力。而德格土司则只控制大小头人50余名，所辖属民约5000户，除了控制德格的部分地方外，其势力主要在金沙江以西的同普（ཐང་ཕུག，今江达县）等地⁸²。夏克·刀登发动的运动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被看着是现代的，他直接向民众提出“不给土司服差役，不给土司交赋税”的口号⁸³。德格土司政府感觉到夏克家越来越威胁到自己的统治，因此，降央伯姆计划召集其属下，并联合其娘家囊谦土司的军队，用武力来反对夏克家的崛起。夏克·刀登的崛起也是对四川军阀刘文辉的一种挑战，因此，后者密令其属下的付德铨团长召集其在甘孜的军队，也准备对夏克家采取行动。1949年，共产党击败国民党，取得最终胜利。由于解放军于同年6月解放了德格，德格土司及刘文辉所策划的反对夏克家的军事行动都落空了⁸⁴。同年11月，夏克·刀登与格达活佛等派代表到北京，向中央政府、毛泽东献旗致敬，请求解放等⁸⁵。

夏克·刀登和降央伯姆都派代表欢迎解放军，表示拥护共产党和人民政府，前者还在康定军管会中担任副主任。其间，他还联络格达活佛（དགེ་ཉག）、邦达·多吉等人，呈信刘伯承主席，表示拥护共产党，请求在西康藏区实现民族自治，自我管理⁸⁶。共产党主张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反对利用一派对付另一派的做法，因而，通过多方调解，使得夏克·刀登和降央伯姆最终解除隔阂，化解矛盾，实现团结⁸⁷。他先后被任命为西南军政委员会委员、西康省西藏自治区人民政府副主席、西康省西藏自治区各界人民代表

81 村民们推举了差民白马群批（པད་མ་ཚོས་འཕེལ）为“宗本”（ཚོང་དཔོན），得到了夏克·刀登的认可。夏克还派其亲信年楚仁青（ཉག་ཕུག་རིན་ཚེན）担任白玉河坡的“锡聂”（གཞིས་གཉེར，管理200户人口的总管），派扎科活佛（རྩ་ཁོག་གྲུལ་སྤུ）白马额郎（པད་མ་ངེས་རྒྱལ）担任白玉热加地方（དབལ་ཡུལ་ར་ཁ་ས་ཆ）的“宗本”，委亲信大头人年楚拉甲（ཉག་ཕུག་ལྷ་བྱུལ）担任赠科的“宗本”，并委任差民俄拉翁其（འོ་ལ་དབང་འཛིན）为白玉八绒（དབལ་ཡུལ་བར་རོང）的“锡聂”等。参见来作中：《夏克刀登传略》，1996：100-101；白马邓登、夏克泽朗：《德格土司家族内部及其与下属头人之间的纷争械斗》，2008：201。

82 参见秦和平：《从反对土司到接受民主改革—关于夏克刀登的研究》，《中国藏学》，2014（1）：65-79。

83 这些口号本来可能是藏语口号，只是汉文材料中将它们译为汉文了。

84 参见来作中：《夏克刀登传略》，1996：101；འཆི་མེད་རྗེ་ཇི་དང་ལྷ་གཡང་། འཕམས་ལྷེ་དགེ་བྱུལ་པོའི་སྲིད་དོན་ལོ་རྒྱུས། 2009: 9215。

85 所派代表“申述藏族同胞对于迅速获得解放的热望”，愿意接受中央政府的领导。朱德于1950年2月19日接见了所派的代表。参见吴殿尧等编：《朱德年谱》（新编本），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6：1367。

86 参看四川档案馆藏1950年3月28日夏克刀登等致西南军政委员会刘伯承亲笔信。

87 夏克·刀登致参信贺龙、邓小平，感谢他们捐信，希望他能与降央伯姆搞好关系，做好团结，愿意带头解决土司与民众的矛盾等。参见四川省档案馆藏1951年1月5日夏克刀登致贺龙、邓小平的亲笔信。

会议协商委员会副主席⁸⁸。在二十世纪五十年代早期，他还历任全国人大代表、四川省政协副主席、甘孜藏族自治州副州长等职。夏克·刀登在新中国康区建政史上起到了重要作用，这也正是他超越其他僧俗上层之处⁸⁹，尤其是在西康藏区（今甘孜州）区域自治以及支援解放西藏两个方面做出了突出贡献⁹⁰。夏克·刀登于1960年病逝，结束了他传奇的一生。

结论

本文试图以夏克·刀登这样一个野心勃勃且富有魅力的政治人物，在德格以至于整个康区政治中崛起为例，来探讨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早期，康区出现的与传统精英不同的新精英阶层。历史表明，在康区就是像土司这样统治者的权威也会受到有野心且富有魅力的个人所挑战，夏克·刀登正是二十世纪挑战传统权威的康区新精英阶层的典型代表，他与其它新精英阶层的代表人物仍有不同之处。以格桑泽仁为代表的接受过“现代教育”的康区新精英的政治活动，主要在康区以外的中国内地发展；以诺那呼图克图为代表的流亡中国内地的宗教精英既在康区，也在中国内地活动；夏克·刀登虽然不得不与康区以外的各种政治势力周旋，但他的政治活动则主要在康区。

作为德格土司下属的夏克·刀登的崛起，表明土司的权力从来都不是绝对的，这是对土司统治严重威胁的又一个恰当例子。像夏克·刀登这样一批二十世纪康区的精英，他们都是康区那个特定历史时代的产物。不像康区的大多数传统势力，他们的眼界比较狭窄，只关心其辖区内发生的事情，夏克·刀登等康区的精英则富有时代责任感，眼界比较开阔，故而能在当时康区的政治中脱颖而出。他于二十世纪二十年代初回到德格后，在三十年里当多种势力角逐对康区的控制权时，他一直与德格土司家族、西藏地方政府、

88 参看邓俊康、李昆璧：《夏克刀登（1900-1960）》，2009：191。降央伯姆先后被任命为昌都地区解放委员会副主任、西康省藏族自治州人民政府委员、西康省藏族自治州政协副主席。她还曾担任康定地区民族协商会副主任、西南民主妇女联合会委员、西康省妇联副主任、全国民主妇联执委等职位。参见邓俊康、李昆璧：《降央伯姆（1913-1988）》，2009：185-187。

89 参看秦和平：《从反对土司到接受民主改革—关于夏克刀登的研究》，《中国藏学》，2014（1）：65-79。

90 参看邓俊康、李昆璧、刘家驹：《夏克刀登（1900-1960）》，2009：191-192。尔后，在对待民主改革上，正如秦和平教授指出地那样，夏克·刀登存在矛盾：从认识上讲，他基本上接受改革，并没有给改革制造过过多的“麻烦”。而在言行上，由于改革触动了他本人及相关阶层的切身利益，却与认识不一致，幻想、动摇，甚至有“出格”的举措。而他之所以不稳定、存在矛盾，除他自身的问题外，还与当时改革方针、政策的不坚定有关，影响了他的言行。参看秦和平：《从反对土司到接受民主改革—关于夏克刀登的研究》，《中国藏学》，2014（1）：65-79。

西康军阀刘文辉以及青海的回族军阀马步芳间不断发生冲突和斗争。夏克·刀登与各方势力周旋的过程中，对这些势力的政治主张都有所了解，并通过建立各种联盟，不断地增强其权力与权威。因此，他是康区那个时代精英的代表，是与那个时代同步的“政治强人”。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和四十年代他成为康区历史上最有影响力的人物，并挑战了德格土司家族的权威。夏克·刀登也通过塑造一个统一的康区身份使其权威合法化，并采纳了一些改革的新思想。就此而言，夏克·刀登就显得具有一些比较现代的意识。夏克刀登熟知当时在中国发生的思想和社会变革，他有效地实施了民粹主义者的社会变革事业，并将德格土司权力逐步削弱，从而成为可以和德格土司抗衡的权威人物。在康区动荡不安的时期，他利用各种势力，寻求民众的支持以增强自己的权威，证明他是一位很有政治手腕的人物。德格地区的人民厌倦了动荡不安的局面，并将夏克·刀登视为能给该地区带来和平的领袖。因此，他们让夏克·刀登崛起成为德格地区一个新的独立统治者。

◆ 玉珠措姆 四川大学中国藏学研究所副教授